族气节：《大江东去》之魂

汪启明

尽管张恨水“赶上时代”的第二期创作，成就卓著，引人注目，但他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束缚着他、困扰着他，使他难以自拔，以致产生自卑感：“恨水忽忽中年矣，读书治业，一无所成，而相交友好，因其埋头为稗官家言，长年不辍，喜其勤而怜其遇，常以是相嘱，恨水乃以是得自糊其口，当今之时，雕虫小技，能如是亦足矣，不敢再有所痛也。”（1）“九·一八”以后，举国惶惶，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站起来大声疾呼：“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2）“聊报国家于万一”，公开宣称“与抗日无关作品我更不愿发表”，小说观念、创作目的终于在抗日的烽火中发生了质变，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跋涉的步履显得更加坚定沉稳，而且公然将小说的功利价值纳入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中作为其美学追求、审美标准：“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思进去。”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融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抗战小说。从题材上分，有军事小说、历史小说、社会讽刺小说三类。一般认为，他的社会讽刺小说思想水准最高，因而对其研究颇多，但却忽视了他的“军事小说”的研究。客观地说，张恨水这期间创作的军事小说数量多：主要有《冲锋》《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感染力强，叙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抗日志士形象；思想深刻，闪耀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光辉。难怪张友鸾动情地说：“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3）拙作试图通过对《大江东去》这部当年“销数较多”，曾被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同10个部委向全国读者推荐为百部抗战文学名作的力作的剖析来对小说观念、创作目的发生质变后的张恨水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研究提供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

张恨水自从开始“叙述人生”的“社会小说”创作生涯之后，便以执著的追求、严谨的创作态度艰难地跋涉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他对自己“叙述人生”的“社会小说”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固然，幻想人生，也不一定就是超现实。……但写社会小说，偏重幻想，就会让人不相信，尤其写眼前现实的，若是超现实，就不是社会小说了。”这点，研究者是认同的。但对张恨水的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真实性却持异议：“作者‘对军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他虽有爱国的热情，但无战争生活的实践和经验，那么，他是怎样写军事小说呢？只得凭借文件、资料和别人的叙述进行创作。这样，反映在他作品中的就不乏空泛和不切实际的成分。”（4）对此，我本不敢凭空妄说，但通过审视《大江东去》这部力作后却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张恨水的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恪守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首先作者笔下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与有关史料相吻合。尽管《大江东去》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但其真实性、准确性令人叹服。在此，不妨将小说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与有关史料略作比较：

1.1死的不但是中国的壮丁，老人也有，女人也有，小孩也有。有的直躺在枯的深草里，有的倒在枯树下，有的半截在水沟里。而唯一的特征，女人必定是被剥得赤条条的，直躺在地上，那女人的脸上，不是被血糊了，便是披发咬牙，露出极痛苦的样子，有的没有头，有的人也没有了下半截。有几根电线柱上，有小孩反手被绑着，连衣服带胸膛被挖开了，脏腑变了紫黑色，兀自流露在外面。有的女尸仰面卧着，身上光得像剥皮羊一般。而在她生殖器或肛门里，却插着一支两尺长的芦苇。……尸体也不知有多少在广场中间堆叠起来，竟达丈来高，寒风吹了死人的乱发和衣角，自己翻动。

（《大江东去·第十六回》）

1.2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下文简称《再研究》）

1.3两个军曹比赛杀中国人。十二小时内，一只手杀了一百八十六人，一只手杀了三百一十三人。这个比赛胜利的，还写了报告寄回国去呢。

（《大江东去·第十六回》）

1.4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人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人和106人之数，但二人相约杀生1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再研究》）

1.5原来那水面浮有七八具露体女尸，被一粗铁丝将乳峰穿着，成串的穿在一处。女尸由水里飘浮起来，身体浮肿了像许多牛皮囊。

（《大江东去·第十六回》）

1.6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蹂躏我妇女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再研究》）

1.7见东南城角的天空上，浓密的焰，比昨天还要占领得空间大……到了晚上，天空里像晚霞一样红亮，便是前殿后殿不点灯火，也照着每个角落都是亮的。……南城的天空，那火头已分不出几个，只是高低大小联结着，像一列火山。……这南城的火头，下半截是红色的，有时也带了一阵绿焰，涌起几十个尖，形如蛇舌，在空中煽动，中一层是零碎的火星，涌成百丈巨浪。上一层是紫色带黄色的烟，像云团一般卷着，倒了向上滚。

（《大江东去·第十五回》）

1.8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再研究》）

1.9进了城的敌兵，已钻进南京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第一个目的是找女人，第二个目的是杀壮丁，第三个目的是掳财物。……司令看到佛案上那个铜香炉和净水瓷瓶，是两项古物，他觉得放在这僻静地方不大妥当。

（《大江东去·第十六、十七回》）

2.0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

（《再研究》）

通过上面五组材料的比较，可见张恨水用近乎史学家的笔法立体地全面地形象地反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张恨水一再强调，“小说就是小说，并不是历史”，然而对日寇屠杀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笔笔血债却“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其次，国军将士浴血守卫光华门最终弱不敌强寡不敌众的战斗描写同样合乎历史的真实。当时“我们”不能自造飞机坦克，加上四个月的东线鏖战，只剩下极少数的重兵器，在强大的敌人的攻击下，“我军”伤亡惨重、形势严峻，但从师长、团长到班长、士兵们都不怕流血牺牲，以挽回光华门的危局。但最终寡不敌众，“到了十二月十三日，留守的最高长官，已下令作战略撤退。”据史料载：“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处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第九师团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之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5）

其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孙志坚生活中有真实的原形。作者在《大江东去·序》中说：“旋陈君更述一故事，以助余兴，则为一军人困于失陷之南京，虽得生还，而有破镜难圆之叹。”至则座上有一少年军人，丰姿英爽，侃侃而谈。刘君笑曰：“此君与君所书《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据史料载：“另一位教导总队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军兴时，正毕业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机。”

可见张恨水的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也是立足于真实、植根于真实的。作者之所以逼真地再现南京屠城这幕血淋的惨状与“我”城将士的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一则是控诉日寇的惨无人道；二则是鼓励民气，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奋起抗日。敌人不是要“灭我们的种”吗？作为一个正义感的中国人难道能无动于衷束手待毙吗？

当然，不可否认张恨水从事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创作多取材于从战场上归来的将士们的叙述与“许多作战文件”，那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张恨水的军事题材小说里是怎样达到和谐统一的呢？

其一，来自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和民族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九·一八”以后，他常常哀叹“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要“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回故乡打游击。他在《弯弓集》的《健儿词》中呼道：“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然而请缨无路，只得将这种“为爱国而发狂的感受”发泄于笔端。

其二，来自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尽管张恨水“对军事百分之二百的外行”，但他却善于积累善于搜集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到资料室查阅有关作战文件，找前方将士进行座谈了解军事生活。创作中更是一丝不苟，《大江东去》这部小说中有些章节改动较大，共花了三年时间。“民国二十八年冬”从友人陈君那里获悉南京失陷时一个“男女之离合”的故事，“以未有火线经验，固置之未用也。”“半年后，有两军人为邻，暑夜于星光中移榻纳凉，闲话天下事，亦尝问及战争。耳食人余，颇能补常识之不及。”“凡积一年而成”，然“予所谓京沪线之战与南京之被屠，固未能畅所欲言，意实未尽惬也。”“三十年冬”，由友人刘君引见一少年军人，“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之役，”“乃慷慨唏嘘述南京失陷惨状。及予询及光华门之役，彼则告以某班长一手榴弹换救危城之壮举，绘声绘影，令人兴奋。”诚如刘君所言“不啻使君入火线索”。又过了一年，在《大江东去》再版时，“乃割去原稿十三至十六回及十七回之半回，而易之以今稿。”（6）严谨的创作态度也能弥补作者生活中直接体验的不足。《史记》全面地反映了战国至秦汉这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许多重大斗争，表现了处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动态，难道司马迁对此样样都经过了亲身体验？徐迟写作《歌德巴赫猜想》，难道能说他精通数学知识？张恨水成功地创作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个中”奥秘也在此吧！

其三，来自他的生活体验。尽管张恨水没有军事生活体验，但却饱受日军狂轰烂炸之苦，办《南京人报》，每每行到半路途中，警报就来了，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上去的炮弹看得清清楚楚；到重庆，日军飞机常常大炸特炸，张恨水从不躲防空洞，他要“亲眼看到日机施暴的罪行。”（7）因而写战火纷飞的场景也就能得心应手。

其四，避实就虚扬长避短。为了弥补直接体验的不足，他却在“军事小说”的文学性上独辟蹊径，把炮火硝烟置于幕后，让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体，泼墨于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人物，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创作方法是对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探索，孙犁的《荷花淀》，茹志娟的《百合花》均是成功地实践这一创作方法的结晶。

二

对于抗战文艺，张恨水的见解是科学的，也是独特精辟的。他始终强调抗战文艺的文学性，认为：“文艺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代，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直率的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8）小说“若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兴趣……”（9）并历来反对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针对“抗战八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期间，一切要求打败日本，文艺不离开抗战，这是对的，不过老是那一个公式，就难以引起人民的共鸣。”因此在张恨水的抗战小说的创作中，“战争即或是足以构成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小说的战事被淡化了，人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成为他作品的主体。不仅如此，写人，他不在于注重人物的戏剧性冲突的外部动作，而是把艺术的镜头更多地摇向人的‘内宇宙’，突进了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等深层次的内心活动的描绘。”（10）《大江东去》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丰富内心世界与崇高精神品格的抗日志士形象。

在众多人物中，民族气节是其性格的核心。关于“民族气节”为何成为众多抗日志士性格的主体，张恨水在《弯弓集·跋》中表述得极清楚：“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离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戳矣，则以扬民族思想，以与来缚来戳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这里有岳母式的识大义明大体的贤明的孙母，虽然她鬓发半白，虽然孙志坚是她的独子，但为了民族的存亡，却把这种挚爱埋在心里，教育儿子从“小我”的圈子里走出来：“当军人的现在应当以国家为前提”，“我虽只有你这个独子，但我既让你做了军人，我就要你有成就”。并鼓励儿子上前线：“你是个军人，军人对于光荣，胜于生命，我望你向光荣的路上走，去吧。”难得的是这位老母亲将孝顺与报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你不必挂念我。你要明白，我的儿子既是军人，我就要他做个荣誉军人。你的荣誉，就是我的荣誉。我不能留你在上海不走，那样增加你的耻辱，也就增加我的耻辱。你听我话，也就孝顺了我。”有舍生取义的沙河和尚，四十年前，他也是一位执干戈卫社稷的志士，同孙志坚一样因外国兵的追逼，只得进了一个古庙当了和尚，他虽然遁入空门，但却始终跳动着一颗爱国之心。“为国家爱惜羽毛”，他冒风险收孙志坚当和尚以逃避追杀；为了使孙志坚逃出日寇魔掌去报效国家，竟然以自己的生命与日寇周旋：“不必很久远，你可以回到南京来的，但你见不着我，也见不着师叔，你师兄是可以见到的。我们的坟，就会在这庙后，回来之后，你可以在我们坟前再念那半段心经了。”一席话壮怀激烈，摧肝沥胆，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歌可敬的爱国志士形象便立于纸上。有以身许国血染疆场“至高至上”的战士，班长尚斌，在光华门旁边的城墙被炸开缺口而又被敌人用机关枪封锁无以抢修工事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愿肝脑涂地，报效国家，不消灭那挺机关枪，我也不回来。”为了消灭这挺机关枪，他连手都伸进掩蔽工事里去，给予敌人挑上刺刀的一个机会，这一只手，挽回了光华门的危局。尚斌成功了，也成仁了。

作者力图把笔墨放在江洪、孙志坚这两个人物身上，使之毫不逊色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

民族气节在江洪身上表现在“义”字上，他是一个集民族大义与朋友“小义”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用孙志坚的话说：“必须一个确守私德的人，才可以办好公事。必是一个对朋友守信义的人，才可以对国尽忠。”在江洪的性格层次上，第一个层面是民族大义，他“以当兵为荣誉”，崇尚“大无畏精神”、“为国牺牲精神”，认为“当军人的随时都预备为国牺牲”，“军人的最高尚的武德”是“死守阵地，又能完成任务”。其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朋友间的侠肝义胆。为了让自己的朋友无牵无挂地奔赴前线，他义不容辞地接受朋友的重托；为了完成朋友的重托，他呕心沥血精心安排“十分卖力”，江南车站遭敌机轰炸，他舍身救冰如；孤身危机，芦苇滩上，他悉心照顾冰如，生怕她有半点闪失；冰如“受了感冒”，他不辞劳苦到附近渔村去找人家养病；为了完成护送冰如的任务，他四处奔波，不怕疲劳，接洽船只；他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由九江到汉口的船上宁可在舱外受冻也不进舱内，最终病倒了，用“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保护二位皇嫂，千里迢迢投奔刘备”来比他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南京陷落，孙志坚几个月都没有消息，冰如居然大胆地追求他时，他与冰如的关系始终没有超越“友谊”，他说：“在身份上说，你现在还是一位太太。我是一个少年军人，似乎不应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谈恋爱，更不应当和一个友好的太太谈恋爱”、“至于情感方面说，我和老孙的感情，那比亲手足还要好些，我一想到了他那番情谊，我就决不忍和你谈到爱情。”这一席话是民族大义与朋友“小义”相融合的结晶，闪耀着传统美德的光辉。当从冰如那里得知志坚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口气更坚决，“在你我的情形之下，有这种举动，岂但对不起朋友，那也为社会所不齿。再就我家庭说，是相当崇尚旧礼教的，我若作出这种事来，父母不以我为子，哥哥不以我为弟，我有我的前途”，“无论哪种无情无义的女人，我不屑于追求。就算我追求她，我和她丈夫既不是朋友，而且她的丈夫也没有把妻子托于我。充其量不过是我不识人，我不会色令智昏，卖了朋友，也不会是个社会上的罪人。”毅然从爱情纠葛中挣脱出来走上抗日的前线。感情与理智的搏击是其性格的第三个层面。黑格尔说过：“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心灵性的表现。”小说还多层次地提示江洪的内心世界，江洪是“相当崇尚礼教”的，他的婚事，“必定要经过正式的手续，先得家庭许可”，是一个很“规矩”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九江遇到大时代剧社唱戏的王玉，尽管王玉是离过婚的女人，但江洪一见到她就“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看戏捧王玉的场，又是请王玉吃点心，甚至“同情”王玉的境遇，到汉口，二人更是情好日密，交往频繁，渐渐产生“偏爱”之心，连冰如也吃起醋来。在国难当头之时，作为军人涉足爱河，这当然与大时代不合拍，它表现了人性的弱点，但却丰富了江洪这个人物的个性，让读者感到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在处理冰如的感情上，江洪的内心更复杂，面对冰如的大胆追求，轮番进攻，尽管他恪守“在友谊上更加浓厚”的准则，避免同他交往，但作为“家仇国难”的女人又不好让她过于难堪；与冰如交往过密，加上冰如的紧追不舍，又使他陷入良心的谴责之中。正如江洪所说的：“我完全是用理智克服情感。”也就是说感情与理智的搏击在江洪的心灵深处一刻也没有停止，小说中成功地塑造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智有情感的军人形象。

孙志坚是一个前方爱国军人的典型，他留学归国，受其母影响很深，以“报国”为己任，民族气节在他身上主要表现在“勇”字上。为了抗战，他毅然离妻别家，“把生命交给祖国。”苏沪前线，他带领一个营的工兵战斗，由于他技术很好，又十分勇敢，得到上峰的嘉奖。留守南京城保卫光华门，他深知“责任太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排除险情。光华门里有几个未爆炸的炸弹拦阻交通，他冒着战火，勇敢而机警地带领全营弟兄们奋力排除；城墙上有几处工事被炮弹轰坏了，尽管头上的炮弹是一个接着一个，但他全不理会，只是来往指挥，提前完成任务；在城墙“崩坍出一个丈来宽的缺口堵上”的危急关头，他愿带全营弟兄，用血肉把这缺口堵上，发誓“我们必须成功，我们就是成仁也成功”，并身先士卒，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南京陷落，面对敌人的烧、杀、抢、劫、奸淫，他的心里“是怒、是恨、是惭愧”，“打算去拼几个日本人”，“恨不得张开口，一气把他们吞了”，“愿总理在天之灵，宽恕我们这不肖的后辈。我们不能保守南京，我们使腥膻玷污了圣地，我们使魔鬼屠杀了同胞，我们使魔火烧了这首都。”南京屠城他侥幸得以生还，但是归来时自己心爱的人却变心了，对此，他一度痛苦过，撕照片、砸信物、吃馆子、看电影、去舞场找点“麻醉”，庆幸的是，在用“金石为开的诚心”去打动冰如的心失败后，孙志坚没有沉沦，他还是“一个以国家为前提”的军人，视离合为小事，在“国家存亡”之际，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实现自己的“诺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塑造江洪、孙志坚这两个人物形象其典型意义在于：

其一，讴歌了两位爱国军人崇高的民族气节，江洪身上的“义”、孙志坚身上的“勇”，都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日寇不是妄想亡我们的国灭我们民族的种吗？只要有这样的民族精英在，这种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小说结尾，他们双方奔赴前线，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奔赴前线，意味着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将用血肉筑起长城，反抗侵略！那滔滔江水象征着抗日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从而坚定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心。

其二、深刻地揭示了大时代与“小我”的矛盾，又形象地表现了“小我”与“大时代”的融合。战争，使冰如扭曲了人性，以致使江洪陷入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以致使孙志坚家庭破散。但他们没有为“儿女情长”所羁绊，时代的呼唤，使他们的胸襟变得博大，他们战胜了“小我”，踏上为国尽忠的征程，这预示着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正从“小我”中走出来，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去。

三

张恨水第二期军事题材的抗战小说的主题主要是“反对战争，渴求和平”。在《巴山夜雨》中通过主人公李南泉一次次地责问了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这“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要用大炮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用血去涂染它？”并发人深省道：“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同样，在《大江东去》中也有如此发人深思的谴责：“现在更觉得发动战争的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这种人不但是人类的仇人，而且是宇宙的仇人。宇宙想尽了方法生人，发动战争的人，却想尽了方法杀人。”具体说，作者在《大江东去》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揭示这一主题的。

其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由外国通过翻译转载回来的消息，的确是十分凄惨，只看那死人估计的数目，都说在二十万以上”，在此不再重复，江南车站日军轰炸的一幕足以令人惨不忍视：“她（冰如）口里说着，看到刚才藏身的桥边，已经有二三十人倒在地面，衣服血泥糊了”，“那三棵柳树上，挂了一条人腿，又是半边身体，肉和肠胃，不知是人的还是猪的，高高低低挂了七八串，血肉淋漓，让人不敢向下看。”作者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再现这一幕幕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场景呢？为什么都要用“历史见证人”的眼光来审视这幕幕人间悲剧？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是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11）三来起“唤醒国人”的作用。

其二，歌颂了抗日志士同仇敌忾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无论是岳母式的孙母、舍生取义的沙河和尚、还是战死疆场舍身成仁的班长尚斌，无论是视“义”如生命的上校参谋江洪，还是英勇无畏、屡建战功的工兵营长孙志坚，在外敌入侵之际，他们均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客观上起到了“鼓励民气”的作用。

其三，对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因素予以褒扬，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则予以贬抑。小说塑造薛冰如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后方饱受家仇国难之苦的女子的典型，但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不仅仅在此，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爱憎。南京陷落之前，作者对这个人物是褒扬的，运用的是饱蘸激情的笔调来塑造这一典型的。冰如是一个有志气、有知识、很文明、美丽多情的女性，她深爱着她的丈夫，与孙志坚结婚三年恩爱如初，她认为“嫁一个以身许国的男人，那是荣誉的事”，丈夫出征的前夜，她精心伺侯他，尽管对丈夫有满腔的儿女情怀，却不露一点儿女姿态，劝慰丈夫“你做了军人所应做的事，你就使我很满足了”，赞扬丈夫有丈夫气概，并希望“天天在报上看到我军浴血奋战的消息”。她爱屋及乌，把丈夫的信物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由于心慌意乱抢了出城，把丈夫的佩剑丢在家里，她认为“这剑是军人之魂”，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它取来。她心系战场、心系丈夫，两次梦见炮火纷飞的战场，梦见自己与丈夫并肩战死在战场，临死前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她痛恨战争，从心底里发出对战争的控诉：“多少人为了战争，弄得家破人亡”，并视发动战争的人是人类的“仇人”。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对好友王玉与战斗在前线的丈夫离异，直率地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中国正在对外打仗，妇女有个当兵的丈夫，这是荣誉的”。指责她：“你自己还说为国宣传呢，倒不愿有个为国家宣传的丈夫，那你还对社会宣传什么？”并阻止江洪和这种人交朋友。在通往汉口的船上，她见舱外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身体不太好，便让他搬进自己船舱里睡。她说：“于今全国人都在同舟共济的时候，凡是中国人，只要有力可出，就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南京陷落后，孙志坚有几个月都没有消息，这使她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她坐立不安，痛苦长期煎熬着她，使她自我麻醉，加之她鄙弃的“一个向堕落路上走的女子”王玉大胆地追求江洪，这使她的心里发生了变态，她也“向堕落路上”滑去，先是“吃醋”，继而与王玉展开竞争，直言不讳地说她要追求江洪，逼迫江洪表态，要在“友谊”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而且不顾王妈（佣人）的讥讽：“这些相片，还是太太在下关上了船，又跑回南京去拿的呢。为了这个，没有赶上轮船，就光华门外遇到轰炸，现在全不要了吗？”不顾父母的劝阻：“无论是中国哪一个角落，寡妇再改嫁，在丈夫死的最近期间，总也不便开口。你的丈夫死与未死，还不能说，你就改嫁，你一点人类的同情心也没有，你还讲个什么人情？”甚至当收到丈夫的信得知他生还时，她不但没思过，没有回心转意，反而一意孤行，志坚的真情没有打动她，朋友的忠告没有说服她，“小我”的膨胀，使她忘了先前所崇尚的“牺牲精神”。使她变得目光短浅，最终陷于自己于不仁不义之中。尽管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同情，“现在非常时期，一切事情就不能照平常法理人情去判决”，“这个大时代，人事变化的就太多了”，从而把冰如的“变态”归咎于战争，但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冰如前后矛盾的思想言行，周围人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这种以“小我”为轴心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深度与力度。

有人认为：“《大江东去》中，无止无休的多角恋爱和抗战生活纠缠在一起。虽然最后以民族大义战胜了男女之间的私情，但大大减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12）通过分析，我认为这种观点失之偏颇。袁进曾就抗战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以至我们一直到今天，还依然缺乏能够在高水平高层次上再现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我们中华民族各种心态的小说巨著，只有汗牛充栋的‘打鬼子’通俗小说。”（13）（14）反映抗战生活与描写爱情纠葛本没有矛盾，如果处理得正确，不但可以深入地反映生活，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调节作品的气氛。就《大江东去》这部小说来说，作品中的“多角恋爱”描写，非但没有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反而扩大了作品的内涵。一方面通过战争扭曲了冰如的人性的描写，从侧面从一个较深的层次上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另一方面避免了作品公式化、人物脸谱化的弊端，小说塑造了大时代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小我”与“大时代”的矛盾，对人性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索，而且作品表现的人性，并非抽象的人性，它与民族大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具有典型性。倘若抗战小说除了写“打鬼子”之外其它一概不能涉及，那作品那人物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吗？此外还表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作者塑造薛冰如这个人物形象告诉人们：“个人主义”于抗战无补于已不利。这是思想观念创作目的发生质变之后的张恨水第二期小说趣味性减弱思想性增强的具体表现。

当然，较之张恨水后期的抗战小说，《大江东去》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并没有认识清楚，从小说主人公江洪对战事的分析就可略见一斑：“上海的战事，的确是不利。我们军人，对这个地方的战事，本也有两种见解。第一种认为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我们在京沪杭两路上多打一天，就表示我们的军队有多抗一天的力量，可转移国际视线。第二种呢？就认为在这三角地带取守势，敌方可以用海陆空的力量集合于一点来攻我。我们的炮火不如人，这样作阵地战，那是太不合算的。”其实，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与他们奉行的消极抵抗政策不无关系，对此，张恨水在《巴山夜雨》等抗战小说中的认识是深刻的，在此不再赘述。但不可据此而否认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

注 释：

（1）张恨水《剑胆琴心·序》。

（2）张恨水《弯弓集·序》。

（3）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4）《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二卷）第441页。

（5）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载1995年第2期《新华文摘》。

（6）张恨水《大江东去·序》。

（7）张晓水张二水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

（8）张恨水《偶像·自序》。

（9）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

（10）见拙作《战争与人性：一个新课题的率先探索》，载《张恨水研究会会刊》1990年试刊号。

（11）张恨水《巴山夜雨》。

（12）袁进〈试论张恨水抗战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及意义〉。

（13）《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二卷）第441页。

（14）余下文中引用张恨水的话均出自《写作生涯的回忆》。

**作者简介：汪启明，潜山二中副校长。**